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改革从这里起步

——中国农村改革

Gaige Cong
Zheli Qibu

丁龙嘉 ● 著

安徽、四川率先撞击「左」的坚冰
包产到组、联产计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农村改革
七省农村工作座谈会和张浩来信
安徽包产到户在困境中发展
包产到户在全国大争论中站住脚跟
大寨旗帜黯然失色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遍及全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
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中国农村改革第二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C101427

改革从这里起步

——中国农村改革

Gaige Cong

Zheli Qibu

丁龙嘉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贾兴权

装帧设计 丁 明

改革从这里起步

——中国农村改革

丁龙嘉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铁四局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8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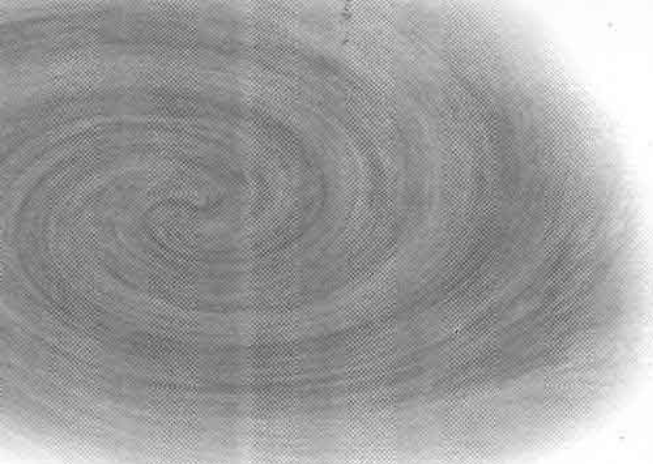
版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212-01583-0/D·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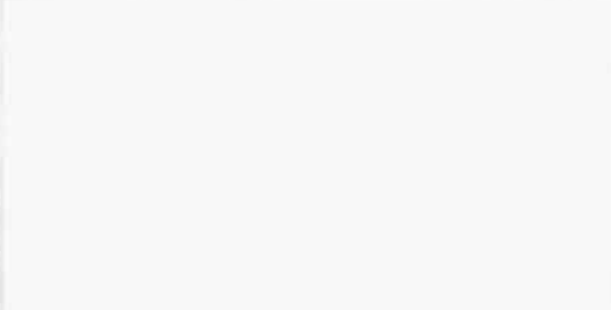
定价 14.00 元

印数 00001-1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目 录

第一章 安徽、四川率先撞击“左”的坚冰	1
一、大寨旗帜仍在飘扬	1
二、万里在安徽率先反“左”	4
三、赵紫阳在四川温和反“左”	12
四、陈永贵挑战万里	18

第二章 联产计酬、包产到组	21
一、安徽滁县地委关于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	21
二、万里组织文章论联产计酬	26
三、三人深夜畅谈包产到户	29

第三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撑腰	34
一、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34
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37
三、大包干到组和包产到组	44

第四章 改革和反改革的初次交锋	51
------------------------------	-----------

2737/15

一、张浩来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引起轩然大波·····	51
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54
三、皖川两省顶住压力继续改革·····	60
四、华国锋态度暧昧·····	66
五、改革在争论中前进·····	69

第五章 包产到户在安徽第四次兴起 ·····	72
一、包产到户在肥西县山南区发端·····	72
二、包干到户在凤阳县小岗生产队诞生·····	83

第六章 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 ·····	90
一、燎原社的夭折·····	90
二、包产到户的生而复灭·····	95
三、责任田的争论·····	98
四、冒死进谏·····	109

第七章 围绕包产到户展开大争论 ·····	122
一、安徽为包产到户落“户口”·····	122
二、北京会议上的争论·····	128
三、《农村工作通讯》与《人民日报》交锋·····	132
四、万里组织文章反击·····	137

第八章 邓小平与中共中央为包产到户正名 ·····	145
一、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	145
二、王郁昭勇为包产到户辩护·····	148
三、1980年中发75号文·····	151
四、《阳光道与独木桥》·····	153

第九章 大寨旗帜黯然失色	162
一、迅速升起的大寨旗帜	162
二、“左”倾路线的样板	169
三、由辉煌到黯然失色	179

第十章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遍及全国	183
一、百人大调查	183
二、为双包到户正名	193

第十一章 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	198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
二、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体制	200
三、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	202

第十二章 农村改革迈开第二步	207
一、打开商品经济大门	207
二、农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	209
三、不可回避的六大矛盾	212

主要参考书目	214
---------------------	-----

第一章

安徽、四川率先撞击“左”的坚冰

一、大寨旗帜仍在飘扬

公元1977年伊始,有8亿人口之多的中国广大农村,各级党组织正在大张旗鼓地传达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尽管传达者唇焦舌燥,而农民群众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因为他们正在为填饱肚子和防御寒冷而发愁,正在为如何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季而焦虑。茫茫的大地看不到一点春的气息。

在元旦前的1976年12月10日到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旨报告《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由华国锋的山西老乡、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主讲。这位头戴白羊肚毛巾、身穿对襟褂的大寨人,神采飞扬地要求在全国广大农村,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决完成党中央提出的1980年把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

什么是党的基本路线?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段、阶级矛盾和

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段话,在“文革”中几乎是家喻户晓。

什么是大寨县?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小山村,1964年,是自力更生的典型。不久,成为个人崇拜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典型。1965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农业靠大寨精神》的社论,文中说道:“大寨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就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穷干苦干巧干实干,吃大苦耐大劳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社论。社论指出:“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广,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只有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才是抓住了推广大寨经验的要点。”在这次会议上,要求将大寨一个村的做法,应用于整个昔阳县。后来,又要求全中国2000多个县都学习昔阳。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在总结报告中,要求到1980年全国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大寨,在“文革”中形成了一套极左的方针、政策。概而言之,即在所有制上,认为公有制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竭力推行“穷过渡”,扩社并队;在分配制度上,否定按劳分配,竭力推行平均主义,实行“政治工分”、“大概

工”，平调生产资料；在管理制度上，融党务、行政和经济为一体，实行高度统一。山东省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曾概括为“大、公、平、统”4个字。另外，在经济发展方针上，实行以粮为纲，排斥商品经济，收回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而推行这一切的手段，就是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

农业学大寨运动，扼杀了8亿农民的积极性，把中国农村乃至城市推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57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同时，约有2亿人口不得温饱。

1978年，每一个农民，一年中可以得到约105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一天中可以吃到280克粮食和一把麸糠。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1亿人每天挣1.37角，有1.2亿人每天挣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0.6角。^①

这是平均数字，距甘肃省省会兰州市仅40公里的榆中县上庄公社更为可怜。“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40到100斤！老百姓靠借帐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102.6元之多。全公社49个生产队，有48个队人均收入40元以下；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88户；在15元以下的41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7000多人，竟有4371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2300至2800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②

那么，8亿农民给城里人提供的食物怎样呢？当时，城市里实行定粮，一般成人每月不超过15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和军

①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第105页。

②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人,可以吃到 22.5 公斤。另外,凭票证,每人每月可以买 0.25 公斤猪肉、4 个鸡蛋、半小瓶豆油、0.1 公斤白糖、2 块豆腐、0.05 公斤粉丝。孕妇,享受特殊照顾,凭证明可以买 1 公斤红糖。回族市民比汉族市民优越些,可以凭票买 0.5 公斤牛肉或 0.5 公斤羊肉。^①就是少得如此可怜的食品,农村人也是可望而不可及!

中国农民到了困苦不堪的境地;

中国农业走到崩溃的边沿;

中国农村出现危机四伏的局面。

严酷的现实,要求党中央立即进行改革,调整政策。当时,一份关于某个贫困地区的内部报告尖锐地指出:如果还不对过去的农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农民终究会起来打我们的扁担。

二、万里在安徽率先反“左”

“左”的冰封毕竟不能长久,而改革的地火终究会在适当的地区喷涌而出。

安徽,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后,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迟迟不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捂了整整 8 个月的盖子,使安徽成为全国的老大难省份。1977 年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文件,决定调 1975 年跟随邓小平进行整顿的四条汉子之一、铁道部长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万里赴任之后,依旧是大刀阔斧的作风。他果断地排除了派性的干扰,妥善地处理了最紧迫的问题,初步整顿了地、县两级领

^①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01 页。

导班子,稳定了大局,实现了安定团结。虽然打开了局面,但是问题依然成山。十年动乱后的出路何在?万里在苦苦地思索着。

恰在这时,万里收到了滁县地委《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滁县地委在1977年春季经过几个月调查后形成的。5月,曾上报给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这位省委主要负责人以“落实政策不能影响大干”为理由,搁置一旁。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指责按劳分配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集体开展多种经营是“金钱挂帅”,关心群众生活是“福利主义”等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如果不把“四人帮”搞乱了的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就不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报告并就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意见。这份报告引起了万里的重视。8月,他将报告批转印发给全省各地、市委,并作了批语:

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万里深感安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他自小生长在农村;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边区的广大农村打游击,开展民主民生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在冀鲁豫边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反蒋自卫,整天同农民打交道,熟悉农民,心与农民是相通的。但是,全国解放以后万里没有再做农村工作。南京刚解放,他参与接管工业。不久,随刘邓大军来到重庆,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到北京,不论是在国务院工作,还是在北京市工作,管的是城市建设、工业交通,没有分管过农业。这期间的1958年北京市建立人民公社时,万里曾到农村视察过。当他发现公共食堂问题很多时,就提出不能这样搞。但在当时,他的意见不会引起重视。第二年,万里又去了一趟农村,当看到农民自留地的庄稼比集体的庄稼好得多时,不禁感慨万分。可是,他的意见依然没有人听。这时,

万里深感有重新学习的必要,便亲自下乡进行调查研究。

万里下乡,轻车简从,一部车子,一般是万里、秘书或警卫员、司机,有时有一名新华社记者,共三四个人。他事先从不打招呼,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直接到村到户。发现问题后,再找县委、地委商量解决。沿途,他一不开会,二不作指示,三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

在革命老区金寨县,万里深入到红军烈士家属的破屋里。他看到见了底的米缸和裹着露出棉絮的棉袄在寒风中哆嗦的老人、小孩,看到了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甚至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

在江淮平原上,万里来到农家茅棚。他环顾四周,土坯墙,正面墙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窗上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纸,后面墙上连个窗户都没有,屋内低洼、潮湿、阴暗。他掀开床,床是用秫秸垫成的,上面铺了些麦秸,再上面堆着一床又破又脏的棉被。他揭开锅,锅里装着用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成的粥,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看着眼前的一切,万里,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硬汉子不禁流下了眼泪。他万万没有料想到,革命成功近30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他不停地念叨着:“我们何颜以对,问心有愧啊!”

在定远县严桥公社红岗大队,这个安徽省学大寨的典型,万里看了看田里的庄稼,长得还可以,但仔细一了解,是用化肥催出来的,是做个样子给上边看的,产量不低,成本很高,社员很苦。这里的干部强调的是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这个大队“学大寨”,就是抓“大批促大干”,取消了自留地,不准社员搞家庭副业,实行“大寨式”的“大概工”,取消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

3个月的调查,3个月的见闻,促使万里反复思考:

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为什么变成了普遍贫

困的现实？

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怎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普及大寨县，是中国农业的出路吗？

人民公社这个体制到底行不行？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

更为严峻的事实摆在万里面前：1977年，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够维持温饱。其中，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40元。他这位省委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非改弦更张、另辟出路不可！

这就是万里得出的结论。

万里决心一下，回合肥后立即同省委书记顾卓新、赵守一反复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后，万里又派省农委主任周日礼等再下农村作专题调查，起草对策文件。不久，省农委草拟出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省委常委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这份《规定》。为了慎重起见，又发下去征求意见。经过几上几下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形成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因为规定有6条之多，所以人们又简称为农村《六条（草案）》。

为了让各级领导干部真正理解并自觉地贯彻这份文件，万里决定以省委的名义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

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各地、市、县及各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万里从如何对待农村、农业、农民这个根本问题出发，发表了《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的重要讲话。讲话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实，言简意赅，观点鲜明。

万里开宗明义指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目的是“把农民发动起来”。他说，安徽是农业省，农业搞不上去问题就大了；农业一落后或遭了灾，就会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了。

什么样的农业政策是好的政策?什么样的农业管理是好的管理?万里指出,好的政策、好的管理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政策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万里强调指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只要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能上得快。”在这里,万里强调了政策的重要性。

万里指出,要把安徽的农业搞上去,靠两大武器:“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一个规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好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直反“文革”批判过的观点。胆量不可谓不大,见识不可谓不高,然而,风险也不可谓不大。不过,万里没有虑及个人的荣辱,因为他心里装的不是自己的乌纱帽,而是广大饥寒的农民群众。

《六条》的主要内容是:(一)要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要切实加强生产管理;整顿和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健全严格的财务制度。(二)要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既要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又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社队企业所需的劳动力,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与生产队协商解决,所需的资金,主要靠发展多种经营逐步积累,不能采取平调的办法;严格控制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严格控制享受固定补贴的人数;任何单位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财物、土地或发动社员投资捐献。(三)分配要兑现。要在

狠抓根本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多种经营;要尽快改变分配不能兑现、无现金分配的状况;积累和分配的比例要适当,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四)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粮食收购绝对不能购过头粮。社员的口粮标准达不到规定起购点的生产队,坚决不收购。(五)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队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有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安排生产;领导机关不能瞎指挥。(六)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在完成国家派购任务以后,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这些内容,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在当时却已冲破了一系列“左”的禁区,它所要求的已经不是个别具体政策的改变,而是要彻底纠正农村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

在讲话的最后,万里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在农村起家,农民支持我们。母亲送儿当兵,参加革命,为了什么?一是为了政治解放,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是为了生活,为了有饭吃。现在进了城,有些人把群众这个母亲忘掉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到会人员多年没有听到这样实事求是、动人心弦的讲话了,大家无不为之动情,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与会人员再一次对《六条(草案)》进行了讨论、修改。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作为省委的正式文件下发各地执行。

《六条》一与群众见面,立即引起强烈反响。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虽然寒风刺骨,但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场院上,却是人山人海。这里,正在宣讲农村《六条》。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读;台下,群众则仔细地听,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每当读到关键地方,群众就高声喊:“再念一遍!”夹在群众中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问身旁的一位老汉:“冷不冷?”他笑了笑说:“听到新精

神,天冷心里热,冷点没关系。”张广友又问:“这六条,哪一条您最高兴?”老汉不加思索地说:“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今后大概不会再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一位大队干部给张广友介绍说:“农村开会,人到得这么齐,会场秩序这样好,是多年没见到的。”定远县严桥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干部学习文件后高兴地说:“《六条》实在好!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下子上边‘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也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这样的败家事了!”

当时,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农业方面的会议,一个是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一个是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会上,有人介绍了安徽的农村《六条》,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人民日报社派记者姚力文,新华社派记者田文喜到安徽采访。1978年2月3日,胡绩伟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同时加了编者按语,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编者按语指出:“安徽省委这样深入实际,注重研究,走群众路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这一组文章,对人们了解农村真实情况,反对极左的农村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左”的影响年深日久,加之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斗争,所以,有些干部满脑子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些干部心有余悸。他们听了《六条》,吓了一跳,忧心忡忡地说:“怎么能以生产为中心呢?纲到哪里去了?不怕再批唯生产力论吗?”面对这些奇谈怪论,万里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

1978年1月4日至26日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第一把手参加。会议依然是“学大寨”那一套,而安徽已开始用行动抛弃“学大寨”了,所以万里不愿出席。怎么办